

漳州地方文献丛刊

陈自强 著

白水潭集

续编

太武
名山

九日山

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地方文献丛刊

泉漳集

续编

陈自强 著

漳州市图书馆

谨以此书——

献给吾之爱妻张锦卿和爱女文红，感谢她们长期来对我无微不至的照料！

献给所有的亲人、好友和众多学生，感谢他们给我的真诚关爱！

序

◎ 张大为

陈自强先生的第四本著作即将付梓。

在应承撰写序文的同时，先生的四本著作出版始末，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遍又一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记得先生编辑著作的过程，竟都和他罹病的时间节点相关联。

2004年秋，有一天，先生来电话，央托帮助他收集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发表在报刊上的闽南历史文化论文。听那口气，挺急迫的。不久，当我持着一沓论文复印件去“复命”时，见到的先生，正在市医院住院部病房里，接受化疗后虽发须稀疏，却是豁达开朗不减平日。他说：书要快点出，否则我看不到了。当年12月，《泉漳集》出版。此后几年间，先生笑对“不治之症”，几乎每逢周六上午，我的办公室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听见他风趣的“话聊”。而在图书馆的时间里，他更多是查阅资料，用于撰写学术论文，参加闽南文化方面的研讨活动。近二三年，他还开了博客，和一帮比自己年轻的老学生们在网上“神聊”，俨然忘却了自己是个正在治疗中的病人，以至网友们都可以通过他在博客上出现的频率来判断他治疗的近况。

去年，在例行复查确诊后，先生告诉我，病情有明显稳定，决定抓紧时间编好手头的两部书稿。10月，《漳州古代海外交通与海洋文化》由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院出版。在序文中，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评价，“陈自强老师可以说是漳州史学界研究月港的开拓者之一，他作为漳州一中的特级教师，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仍倾全力于月港研究，且撰写出一批较有分量的传世之作”。12月，《明清时期闽南海洋文化概论》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专家认为，近年来闽南文化研究兴起热潮，论文专著不断涌现，但关于闽南海洋文化的研究罕见，具体涉及某个地域海洋文化的成果不多，一直没有专门的闽南海洋文化研究著作出现，而先生的这本专著“就填补了这一空白”（彭一万序言）。一年中

而先生的这本专著“就填补了这一空白”(彭一万序言)。一年中出版两本有关闽南海洋文化研究的书,可以想象病中的作者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另外我还知道,在出书这件事上,有许多朋友和学生,默默地为先生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这给予他莫大的精神鼓励。

今年五月间,先生再次住院治疗,第一次出院后的头一天,他又给我电话,说他想再编一本书,汇集前三本书以外的文章。要我在他“走”后协助文红把这本书出版。先生显然有“托孤(书)”之意。我当即答应,并和文红商定立即着手编辑,用最快的速度,由市图书馆出版先生的第四本自选文集,以解先生之心忧。由于和《泉漳集》的内容相仿,都是有关闽南泉漳两州历史文化,因此,自强先生定书名为《泉漳集续编》。

一个人的人生旅途就其生命的长度而言是有限的,然而,不同的终极信仰,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生活态度,也许可以决定不同人的生命厚度。我想,“自强”一词源自中国文化元典《易经·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生名字一定是寄托了父辈的一番苦心。他父亲在厦门大学工作而家居厦大校内,因此从少年时代起就接触了厦大的校园文化;大学则是在福建师院渡过的,直接置身于长安山的校园文化之中。这两所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学术研究之风,令他深受熏陶终生得益,闽南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则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并产生召之即来,挥之不去的情怀。他用毕生的精力表达一个闽南赤子的文化情怀,用“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理想诠释一位历史学者的生存价值。先生在漳州一中任教 36 年,桃李成蹊,而他的闽南历史文化学术生涯已超过 40 年。他与“ca 共舞”十年,用四本著作近百万言,浇筑成一座无可厚非的凯旋之柱,展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厚度。

今天,先生再次住院治疗。文红告诉我,先生惦念着,书的封面设计图案采用泉州九日山和漳州太武山的照片——先生心里,割舍不下的还是生他养他、让他深深眷恋的故乡的青山、闽南的大海!

谨以此文见教于先生,希望本书的及时出版,能给予病榻上的先生些许宽慰!

2013 年 8 月 19 日于震北书院旧址

目 录

序

第一辑

- 蒲寿庚行迹述评 003
- 心泉诗友录 015
- 宋代泉州舶使若干人与事 023
- 叶廷珪及其《海录碎事》 029
- 杰出的航海家王景弘 033
- 吴朴及其《龙飞纪略》 039
- 话说吴朴 051
- 略论吴英将军在清政府统一台湾进程中的贡献 058
- 陈昂陈伦炯父子与《海国闻见录》 073
- 我国古代海军文化史的一朵奇葩
——林君升《舟师绳墨》评介 082
- 关于钓鱼岛的若干史实 087
- 论“名宦崇拜”、“乡贤崇拜”的文化内涵与借鉴价值 095
- 趣谈闽南话中的“生理” 110
- 严世同严谟非同一人也
——关于《漳州市志》的一处失误 113

第二辑

简论缅甸中国同盟会的组织状况与历史贡献	119
缅甸中国同盟会的珍贵文献	130
简议徐赞周《缅甸华侨革命史》的文献价值	138
缅甸中国同盟会同安籍成员人物谱	144

第三辑

近代泉州著名爱国绅士吴增及其诗作	153
陈盛明先生传略	161
前 50 年的发展足迹 ——从漳州府中学堂到福建省龙溪中学 (1902—1952 年)	166
拜访老校友叶国庆教授	177
义不容辞 理所当然的责任 ——《笔耕集·续集》编后小记	179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读《追求与奉献》有感	183
漳州市历史学会学术工作回顾(1988—1999 年)	187
我的“一中情结”	192

附录一：

五种书籍对陈自强的介绍	201
-------------------	-----

附录二：

《泉漳集》是一部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难得佳作	213
后记	221

01

第一辑

蒲寿庚行迹述评

蒲寿庚及其家族之研究，是研究回族史和宋元海外交通史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日本学者桑原鹭藏《蒲寿庚之事迹》和我国学者张星烺《泉州访古记》相继问世后，几十年来，史学界对蒲氏之研究不断深入。但也对其行迹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对他的评价，存在着分歧。拙文企图立足于地方史料，略述蒲氏的主要行迹，并对他的是非功过发表一点浅见，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蒲寿庚号海云^①，生卒待考。

郑所南《心史》记蒲寿庚“祖南蕃人，富甲两广”，何乔远《闽书》也记“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这些记载是可信的，可以从蒲氏族谱和蒲寿崧诗作得到辅证。泉州《蒲氏家谱》虽然罗列了未见得可靠的一世至六世的家世，但也称先祖“家居西极”，“世秉清真教”，隐约地透露出阿拉伯血统的真实面貌。广东甘蔗《蒲氏家谱》谓其入粤始祖蒲玛呖呵于宋代“自西域入中国”并记蒲玛呖呵的三儿子蒲玛哈嘎、四儿子蒲玛哈珠“倡筑羊城光塔，俾昼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蒲寿庚的父亲“特捐钜金，赞成甚力”^②。蒲寿崧的《心泉学诗稿》中常提及有关

海外交通贸易的事物,如:“海贾不爱死,适值骊龙眠,深渊顷刻命,平地千丈川”(《明月篇》);“明月照我牖,独起捷军持”(《山中井》);“泉南昔乐土,画戟深凝香”(《送使君给事常东轩先生》)。宋季著名诗人刘克庄《蒲领卫诗》一文中,也说“君家有陶猗之名”^③。——这些,都证实蒲寿庚的确出身于从事海外贸易的阿拉伯血统的豪富之家。蒲氏之阿拉伯籍的另一显著标志是名字本身,其先祖均用阿拉伯人名。蒲,Abu(阿布、阿蒲)之音译,后以此为姓玛咭呵、玛哈曷、玛哈珠,以至其父蒲开守另一名字啞咭咭,均阿语。至寿庚、寿崧……人名才逐渐汉化。

南宋时,泉州港日益繁盛,逐渐超逾了广州港。于是,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广东甘蔗《蒲氏家谱》作“蒲啞咭咭”)由广州徙居泉州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他选择了由泉州港中心港口后渚通往泉州城的必经之道法石,作为大本营。由于为促进中外贸易作出了贡献,南宋政府赐予“承节郎”的官衔^④(甘蔗《蒲氏家谱》作“太中大夫”)。绍定六年(1233),捐资建造倪公祠,淳祐三年(1243)和淳祐六年,出资在当时泉州海外交通要地河市修建了龙津桥和长溪桥^⑤。

大约于淳祐后期(1249—1252),蒲寿庚继承了父业,“擅蕃舶利三十年”。在他手中,蒲氏家族的海外贸易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咸淳末(1274),因与其兄崧平“海寇”有功而得官后,官商合一,更有利于他的海外贸易活动。他在法石建造了一座“海云楼”,“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立于楼亭,海天尽收。正象有的同志所指出,如果没有雄厚的海上实力、巨量海舶,是不用建造海云楼的。蒲寿庚拥有多少海舶呢?《清源金氏族谱》附录“丽史”载:

景炎间,益王南巡,驻蹕泉州法石,张世杰以淮兵三千五百人授寿庚,使将以从,取寿庚货舶四百艘以载军士,寿庚不悦。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

仅在法石被张世杰强掠的货舶就有四百艘,蒲氏所拥有的海舶和资财之巨,可想而知。继后渚宋舶的发掘之后,1982年间,有关单位在法石试掘了一艘南宋海船。从法石是蒲氏海外贸易大本营这点来判断,这艘很可能是蒲氏之船。据联合试掘组的估算,该船长度二十三米以上,载重量约一百吨左右^⑥;以此为准,四百艘的总吨位约四万吨;若以后渚出土的宋船为准,则达八万吨以上。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何况四百艘仅仅是被张世杰抢掠的那部分呢?周密《癸辛杂识》卷下记:“泉南有巨贾,南番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既然蒲氏之婿拥有的海舶八十艘,那么,蒲氏拥有四百艘以上的海舶完全可能。因此,《丽史》的记载虽嫌孤证,似仍可信。

德祐间,蒲寿庚官至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1276)任福建广东招抚使,兼主市舶,掌握了军事、民政和市舶的实权。这与他那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他成为宋元交替之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元朝与残宋竞相争取的对象。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闽,张世杰等护送端宗至泉州港口,“欲作都泉州”(清《云麓禅寺三翁宫记》)。残宋先是授蒲氏那么大的权力,后当元军入闽,又“欲作都泉州”,不正是想靠蒲氏之力,以求在闽广坚持抗元吗?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蒲寿庚来个“闭城不纳”。这对残宋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元至正间,泉州释大圭在《筑城曲》中感叹地写道:“吾闻金汤生祸枢,为国不在城有无。君不见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⑦也算一个佐证。十二月初八(已入1277)元军抵泉,寿庚降元。

对蒲氏弃宋降元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弃宋降元主观上是为着保住自己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使泉州港不因战乱而遭巨大的创伤,并使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

州的当年(以公历而言)得以开港,继南宋而走向极盛。如果与此时的广州港因战乱所遭受的严重破坏作比较^⑧,那蒲寿庚所作的抉择的客观实效,就显得更加清楚。何况元朝统一中国,从当时来讲,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不能因为他弃宋降元,导元倾宋,而视之为什么“反面人物”,更不必给予“外族侵略者的帮凶”,“降元叛宋的丑角”这类的抨击。历史现象之错综复杂,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公式化地一概而论。我们推崇文天祥的气节,但也无须责难蒲寿庚的抉择。

二

肆杀赵宋南外宗室,是蒲寿庚弃宋降元所采取的一个重大决策和关键步骤。至于杀了多少人?什么时候杀?如何评价?众说纷纭。

杀了多少人?《宋天源赵氏族谱^⑨·浚源图谱序》载:“帝昀帝昺航海至泉,招抚(讨)使蒲寿庚以城降元,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寿庚所杀。”广东《新会赵氏族谱》也记“端宗玉牒谓当时寿庚曾杀戮在泉皇亲国戚三千余人”^⑩《丽史》也是记蒲氏“尽杀宋室在泉州者三千余人。”这个数字与当时在泉州的宋室人数吻合,是准确的。关于屠杀的时间,《宋史》记在景炎元年,即张世杰掠夺蒲氏之舟以后,而《心史》、《闽书》等则记在景炎二年,即张世杰回师围城之际。孰是孰非?《宋天源赵氏族谱》收录的写于元大德四年(1300)五月的《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记:

我生泉州睦宗院小府,已登名玉牒。景炎家亡,时甫七岁。我幼主被兵逼至城下,叛臣招抚(讨)使蒲寿庚闭城不纳,尽杀宗人三千余口。我亦刃刃。有达平章者,仁慈人也,无子,见而怜我,遽下马拥抱超跃而去,携居江北,遂养为嗣。既长,为我由良铺送入太学。我虽幼尚能记所自出,自怀水源木本之思。

这是幸免者的一段自述。我们认为这场大屠杀当发生于景

炎元年十二月初八元兵入泉州城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不然，何能有达平章抢救赵由馥之事？这场血腥大屠杀是毁灭性的、残酷的，连七岁的幼童也不放过，大有斩草除根之狠。难怪赵由馥在遗嘱中发出了“呜呼痛哉，天也奈何”的悲叹。赵氏遗族对蒲氏怀有切齿之恨。明成化续谱时所纂的“赵氏家范”中特地立下了一条“仍切勿与蒲姓人结婚，违者不孝”的族规。赵氏遗族的这种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史家如果也持这种态度则是不公正的。因为这场悲剧首先是死者之祖宗贪腐昏庸、苟且偷安所铸成的；而且南外宗子是一群社会寄生虫，他们麇集泉州，增加了泉州人民的赋税负担，破坏了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发展^⑩。我们认为，蒲寿庚的滥杀是残忍的。但也无须过分责难。

这场大屠杀事出有因。据《宋史》载，是因为张世杰抢了蒲氏的海舶和资财，使蒲氏大动肝火而发生的。毋庸置疑，这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还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临安失陷前，垂亡的南宋小朝廷采纳了文天祥“以二王镇闽广”策略，徙封吉王赵昀为益王，判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信王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临安失陷后，以秀王皋为福建观察使兼安抚使，知西外宗正，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由他们先入闽，“抚吏民，谕同姓”。这说明残宋对在闽的宗子怀着极大的期望，视为图谋复兴之砥柱。残宋之所以“欲作都泉州”，这也是一个原因。泉州宗室，除赵吉甫等少数人外，依然倾心于残破不堪的社稷。如端宗到泉州港时，“宋宗室欲应之”（《闽书》）^⑪。连宋朝故臣和一般的士大夫，也积极迎驾勤王，如：

庄思齐，……有子五人，俱英毅卓立。宋幼主南奔，五人者与潮州司马户参写蔡若济倡议迎幼主驾，语张世杰，欲效铅刀一割之用，……^⑫

陈氏自以为世为宋臣，起兵勤王^⑬。当宋幼主一行被迫前往

广东惠州，蒲寿庚准备降元时，宗室和士大夫也进行抵制、反抗，如：

泉蒲寿庚叛，与州司马真子谋降元。必晔逃磁灶村，真子遣兵勒还草降表，必晔持匕首自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万万不能复见子矣。”^⑮

蒲寿庚降元，胁大奎署降表，不从。有门人为管军总管，扶出之，泥封所著书一室，逃入海。寿庚遣兵追及，问其姓名，不答，怒杀之。^⑯

泉州赵宋宗室的存在，对蒲寿庚弃宋降元，对元军最后消灭残宋，显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抗力量。而他们和士大夫的反抗行动，对蒲氏又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不除之，蒲氏何能安抚？因此，即使没有发生张世杰“掠其舟并没其资”的事件，蒲寿庚也一定会对南外宗子开刀的。

蒲寿庚并非嗜血成性的屠夫。他还是讲策略的。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泉州府志》卷五十七载：“蒲寿庚附元，为中书左丞辟，宋故臣在泉者复其官。”如推举原安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荐授原迪功郎郑会子为福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如赵必晔因录曹参军吴伯厚的营救未被蒲氏所杀，“后遂居泉之东陵”，“讲解经传”^⑰。有的后来还当官，如太祖派第十一世孙赵孟伟，初“编籍民伍，读书授徒”，后“奉补将仕郎，泉之市舶税院库存使”^⑱。

三

元朝统治者对蒲寿庚的降仕十分重视。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即元军攻陷临安前夕，元军统帅伯颜就派人到泉州招降蒲氏兄弟。蒲寿庚一投降，就得到信任和重用。十二月，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此举得到了元世祖的嘉许。初，

授寿庚为昭勇大将军(后改镇国上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闽书》作“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十四年七月,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但此时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上任。十五年,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改任中书左丞。置泉州行省时任泉州行省左丞。十八年前后,任平章政事^⑩。二十一年九月,任江淮等处行省左丞,分省泉州。元朝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用蒲寿庚?十四年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⑪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所在。考察蒲氏仕元之行迹,他确实“在‘捍海寇’、‘诱诸蛮臣服’等方面,为新王朝竭尽犬马之力。”

(1)“捍海寇”

所谓“捍海寇”,实际上是指平定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斗争的残宋势力。当时,闽南局势动荡,如《心史》所说,“福建东南沿海诸郡,自景炎后,南兵至属南兵,北兵至属北兵,反复不一。”在这种反复“拉锯”的局势下,蒲氏坚定仕元。至元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张世杰在陈吊眼、许夫人领导的畚族农民军的配合下,回师泉州,声势浩大,围城达七十多天(首尾三个月)。张世杰“欲得蒲寿庚而甘心”^⑫,回师的锋芒直指蒲氏。城里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如宋季进士诸葛直率子、侄企图“开北门以应张世杰之师”^⑬。元军主力不在泉州,蒲氏兵力单薄。形势对他是极其不利的。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庭命运的生死决战。他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泉南卿田尤氏族谱》尤永贤传略载:“当攻泉州九十余日,公晨夜血战,城赖以全”。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这场保卫战的艰苦与激烈。后,唆都来援,九月二十二日张世杰被迫退兵,撤回广东浅湾。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蒲寿庚率部固守七十多天,终

于转危为安,这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干,也表明他对赵宋宗室的血腥镇压取得奏效。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势,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张世杰撤兵后,蒲寿庚的舟师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至元十四年九月,“元主诏塔出与李恒、吕师等以步卒入大庾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合追二王”;十一月,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合于广之富场”。^{②3} 蒲寿庚是否与唆都一起带兵前往,未见史书明确记载。但唆都既然取道泉州,其舟师必然要借助于蒲氏之海舶和人员。因之,第二年三月,元世祖才有令唆都、蒲寿庚行省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之任命。

(2)“诱诸蛮臣服”

元朝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于泉州设市舶司,令忙兀台领之。忙兀台昧于市舶,且忙于征战,只能挂名而已,实际掌管的必是蒲寿庚。十五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联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②4} 旋,任命唆都、蒲寿庚为中书左丞。这表明元世祖把招谕南外诸国的重任寄予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唆都派人刺使南海诸国,首先出使占城。元《国朝文类》卷四十一载“十五年,左丞唆都以宋平,因遣人至占城,还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麻哈有内附意,奏之,诏降虎符,授荣禄大夫,封占城郡王。”出使者谁?写于至正九年(1349)的吴鉴《〈岛夷志略〉序》记:

世祖皇帝既平宋氏,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与其副孙胜夫、尤永贤等通道外国,抚宣诸夷。